

新馬華人 國家認同的轉向

1945—1959

崔貴強 著



廈門大學出版社

新马华人 国家认同的转向

1945—1959

崔贵强 著

厦门大学出版社

新马华人国家认同的转向

1945—1959

崔贵强 著

*

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建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14印张 2插页 330千字
1989年6月第1版 1989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册

ISBN7-5615-0192-7/K·27

定价：5.90元

序 言

在研究东南亚华侨、华人近代史的范畴内，一个重要的课题就是由华侨演变为海外华人的过程。这演变过程决定了以后一千万东南亚华人的命运。在演变过程中，因素错综复杂，并不是三言两语可以交代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东南亚政治环境起了迅速的变化，新兴的土著民族主义浪潮汹涌澎湃。东南亚数以千万的华侨受到了巨大的政治冲击，在他们的思想意识中起了很大的变化。虽然有很多东南亚华侨，眷恋故国，主观上不愿意改变国籍，但形势比人强，客观的政治发展迫使他们对国家认同作出相应的改变。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华人在东南亚华人总数中占很大的比重，他们在战后所经过的历程和以后不同方向的发展成为东南亚华人命运的缩影。

新加坡的华人占新加坡共和国的多数，他们是新加坡共和国近年来在经济领域取得辉煌成就的主要因素，他们都具有高度的信心和理想，朝向更美好的前途迈进。相反的，马来西亚的华人，他们步步受迫，政治、经济、教育和文化的地位江河日下，他们可以说是处在一个进退两难的困境。这种困境的造成是不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它是不是英国人一手造成？或是华人本身缺乏团结和政治觉悟而罪由自取呢？人们容易作一些观察性的结论，但不容易提出具体的史实来解答这些重要的历史问题。有关这些问题的研究，不管在英文或中文都没有较完整的书籍，本书就是为了填补这重大的空白而作。本书广泛地应用战后新马出版

的华文报章和英国殖民部档案，详述战后新马华人对政治变革的反应，从而解释新马华人对国家认同的转变。作者对错综复杂事件的阐述和分析都是条理分明，使人信服，其中有不少新的见解。本书不管在英文或中文书籍中算是一部较有份量的学术著作，对于新马华人国家认同演变的探讨作出重要的贡献。

本书作者崔贵强先生，出身南洋大学历史系，后负笈夏威夷大学，获硕士学位。返新加坡后先后任教于南洋大学和新加坡国立大学。崔先生并任新加坡《南洋学报》主编，对于新马华人史的研究造诣颇深，相信以后他在这方面的更大成就是可以拭目以待的。

颜 清 澧

香港大学历史系

一九八九年六月二十七日

自序

新马华人与中国的关系，大抵滥觞于十九世纪末叶。那时候，清廷为了笼络海外华人的民心，频频遣使外出，抚慰海外侨民，加强侨民对祖国的向心力。另一方面，若干海外侨民，鉴于清廷的腐败无能、祸国殃民，奋袂而起，响应孙中山的革命号召，为革命奔走呼号，终于协助推翻清廷。此后，民国肇造，军阀横行，日军侵华，无不引起海外侨民的关注，从而涉足中国政治，为挽救中国而努力。尤其是当抗日救亡运动期间，新马侨民上自富商巨贾，下至贩夫走卒，无不出钱出力，协助抗战，为抗战历史写下了悲壮的一页。上述各项课题，引起了海内外诸多学者的兴趣，潜心研究，写出了辉煌巨著，成绩卓越。

迨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抗战胜利，百废待兴，不幸却爆发了国共内战，腥风血雨，民不聊生。内战的波澜，波及了新马侨社，在滔天狂涛的冲击下，侨社顿呈分裂，楚河汉界，壁垒分明。关于这段历史，依然是一片空白。为了弥补这项缺陷，笔者决意狗尾续貂，广搜资料、把错综复杂的史实，理出一个头绪来。嗣后，笔者发觉到战后初期的十余年间，正好是新马华人的国家认同转向的过渡时期，即由认同于中国转移到认同于居留

地。这是一个异常重要的课题，其过程复杂而曲折，很值得深入探讨，于是笔者研究的下限延伸到五十年代的末期。

本书的撰述，从酝酿、写作、中断到最终完稿，前后历时十余年。先是在1977年发表了“The Response of the Malayan Chinese to Political and Military Developments in China, 1945—1949”（马来亚华人对中国政治与军事的反应）一篇长文。接着另一篇题名“新马华人政治认同的转变，1945—1957”也跟着发表，这两篇都是初步研究的成果。那时候，正是新加坡两间大学酝酿合并的时期，笔者任职的南洋大学，风声鹤唳，人心惶惶。我不幸碰到了一连串不如意的事，有时彻夜难以成眠，以致精神萎靡，神情颓丧。失望之余，决意放弃学术研究生涯，写作工作于是停顿下来。后来幸好在诸友好的劝慰与激励下，我犹如枯木逢春，恢复生机，继续我的学术研究生涯，最终完成了本书的撰述。

本书之得以付梓问世，完全是得力于南洋学会会长魏维贤博士。他奔走于新加坡与厦门之间，与厦门大学出版社接洽筹划出版事宜，并设法解决出版经费的难题，魏博士可说是本书的催生者。此外，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的林金枝副教授，一位声誉卓著的学者，他对本书初稿作了细心的审核，纠正了若干错误，并从旁鼎力相助出版工作，使本书能早日问世，一应在此致谢。

本书承蒙颜清湟教授写序，生色不少。颜教授是一位研究华人历史专家，享誉士林。他对笔者的关怀与厚爱，永志不忘。

我必须感谢新加坡国立大学当局让我享有一年的长假，使我得以前往吉隆坡国家档案局、台北国史馆、大英博物馆与英国殖民档案局广泛搜集资料。国立大学图书馆显微影片室的职员，在搜集材料及复印资料方面，给我极大的方便，也应致谢。

拙著付印前，曾交国立大学中文系讲师王慷鼎先生与图书馆

日文部主任朱鲁大（炎辉）先生寓目，蒙他们提出不少宝贵的意见。正如上述，本书研究的是一个复杂的课题，囿于个人的学术水平不高，舛误疏漏在所难免，敬祈读者予以斧正。

1989年3月中旬

导 论

本书是研究战后15年间（1945—1959年）新加坡和马来亚（马来西亚）华人国家认同（national identity）的转向。“国家认同”的定义是什么？这里应该有简述的必要。所谓“认同”，是英文“identity”一词的中译，现在已经是相当广泛地被使用的术语。“identity”原来有“身份”、“个性”的意思，至于演衍为“认同”一词，则有“归属感”的涵意。

所谓“认同”或“归属感”，是指个人（即行为的主体）和个人以外的对象（即客体，包括个人、团体、观念、理想及事物等）之间，产生心理上、感情上的结合关系，亦即通过心理的内摄作用（introjection），将外界的对象包摄在自我之中，成为自我的一部份。结果在潜意识中，将自己视为对象的一部分，并作为该对象的一部分而行动。^{〔1〕}

自50年代以后，社会学者在论析政治与社会行为、思想与文化意识时，常应用各种“认同”的术语，如“国家认同”（national identity）、“社区认同”（communal identity）、“政治认同”（political identity）、“文化认同”（cultural identity）、“种族认同”（ethnic identity）、与“阶级认同”

(class identity) 等等，形形色色，不一而足。

所谓“国家认同”，就是个人与国家之间，发生了感情上的结合，在心理上认为个人（自我）是国家的一部分，在自我内部，国家也被内摄，成为自我的一部分。个人与国家已经浑然结为一体，个人以国家的利益即为个人的利益，因此表现在个人的行为上，就是为国家的利益而努力。

有人给新加坡人对“国家认同”作了如下的诠释，作为一个认同于新加坡的公民，他必须要自认为新加坡人，而不是华人、马来人、印度人或混种人；对于象征新加坡团结的国庆日、国旗、国歌、总统与总理、必须要有好感及尊敬，并参与国家的事务，必要时愿意为国家而牺牲。^{〔2〕}

个人对国家的认同，有三个不同的层次，第一是初级的认同。初级认同于国家的人，只是主观地意识到自己是国家的一分子，对国家尚未产生浓烈的感情，因而不大热心参与国家的事务，甚至不闻不问。第二是中级的认同。具有中级认同意识的国民，无不希望自己的国家好，因为他们意识到国家与个人息息相关。他们主动地关心公共的事务与国家的前途，并积极参与有利于人民与国家的种种活动。第三是高级的认同。凡是有高级认同意识的人，都具有浓烈的爱国思想。当国家的利益与个人的利益发生冲突时，不惜牺牲小我，完成大我。一旦国家面临外来侵略，则毫不犹豫地执干戈、卫社稷，虽死亦毫不足惜。^{〔3〕}

来自中国的移民，构成了新马多元种族社会的一个重要族群。直至第二次大战以前，在新马华人的潜意识里，一直认同于中国，他们重乡情、爱祖国。在居留地里，他们只是作客他乡，总希望有朝一日，衣锦还乡，落叶归根。可是第二次大战结束后，时移势变，为了生存与发展，华人的国家认同，不得不跟着转向。

本书研究的时期，上限自1945年，时值新马结束日本统治，战后光复的开始。下限是1959年，是新加坡获得全面自治的年头。在此前两年的1957年，马来亚摆脱了英国多年来的殖民统治，取得独立自主。新马的自治与独立，都是划时代的大事，对华人的心理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作用。在战后几年里，华人国家认同的过程是相当复杂而曲折的。新马华人的社会，可以分为两个群体，即中国移民（及其后裔）与海峡华人，不同的教育背景和历史因素，使这两个群体表现了不同的国家认同和政治行为。这几年的历程大致上可分为如下三个阶段：

在第一个阶段里（1945年—1949年），多半中国移民及其后裔依然眷恋中国，以中国国民自居。不过由于中国与新马政治的遽变，有些华人开始关注当地事务的发展，并以行动来抗议不利于华人生存与发展的政制。另一方面，海峡华人、马共及其支持者在这期间表现了不同的政治姿态。本书的第二至第七章都是论述这期间的华人政治情况。

在第二个阶段里（1950年—1955年），是中国移民及其后裔的国家认同转向的过渡时期。这期间，若干有识之士已意识到转变国家认同的重要性，1949年马华公会的成立及其后来的活动，就是这项转变的反映。此外，华人社团领袖掀起了争取公民权与参政权运动，但广大华人的反应并不热烈，他们对多次市政与立法议员的选举也表示冷淡。

到了第三个阶段（1956年—1959年），由于自治独立已是大势所趋，华人转变国家认同势在必行，于是华人加紧推行申请公民权运动，越来越多华人扬弃了中国国籍，成为当地的公民。1957年是马来亚独立的年头，是马来亚历史的分水岭，但就华人的转变国家认同而言，在独立多年以后，演变过程还在继续运行着。截至1957年为止，华人国家认同的转向，也还只是止于初级

认同的阶段。本书的第八章至第十三章，都是论述第二与第三阶段的演变过程。

注释：

- 〔 1 〕宋明顺，“谈国家意识——国家认同的社会心理”，刊于《新加坡青年的意识结构》（新加坡教育出版社，1980年），p. 225。
- 〔 2 〕Chiew Seen Kong, “Singapore National Identity”, MA thesis,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Aug. 1971, pp52—53.
- 〔 3 〕宋明顺，同上文，pp. 227—229。

目 录

导论	(1)
第一章 背景：华人人口与社会结构	(1)
第二章 战后初期新马的国民党 1945—1949	(25)
第三章 中国民主同盟在新马 1946—1949	(64)
第四章 国共内战冲击下的华人社会	(98)
第五章 华人与马来亚宪制 1946—1948	(153)
第六章 海峡华人的国家认同 1946—1949	(185)
第七章 战后初期马共的国家认同 1945—1948	(206)
第八章 国民党人与马华公会的冲突 1949—1957	(223)
第九章 新中国与新马华人 1949—1957	(252)
第十章 从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的态度看华人国家认同的 转向 1950—1957	(285)
第十一章 马来亚华人国家认同的转向 1950—1957	(328)
第十二章 海峡华人的政治活动 1950—1957	(363)
第十三章 独立建国前的阴影——语文与种族问题	(385)
第十四章 结论	(417)
参考书目	(426)

第一章 背景：华人人口与社会结构

在战后几年里，新马华人的国家认同及其演变，牵涉到许多层面，其情况与过程是复杂的。首先，华人社会有不同的社群，由于历史与教育等因素的迥异，所表现的国家认同也不一致。其次，不同的社会阶层，不同的社团组织所参与的社会与政治活动各不相同，从而表现出来的国家认同的转向也呈多样化。再说，华人的国家认同亦有其历史渊源。为了使读者能廓清来龙去脉，有必要提供有关的背景。

（一）人口结构

远在14世纪末叶，中国文献已有中国人在新加坡活动的纪录。^{〔1〕}随着15世纪初马六甲王国的兴起，马六甲发展为一个国际商港，吸引了一些中国商贾前来经商。明末清初，一些不甘沦为异族统治的福建遗民，也涉海到马六甲定居，因此至少到了17世纪初，马六甲河口已出现了华人的社区。^{〔2〕}

然而，华南移民浪潮的涌入，却始于英国殖民势力伸展到新马地区。1786年英国人占领了檳榔嶼；1819年莱佛士据有新加坡；

1824年通过了英荷协议，英国取得了马六甲的统治权，这三块殖民地便构成了所谓海峡殖民地（The Straits Settlements）。海峡殖民地商业的迅速发展，农业的扩植，港口与城镇的兴建，迫切需求劳动力。在殖民政府的鼓励下，华南移民大量涌入，他们成了海峡殖民地最有价值的劳动力。据估计，到了1836年，新加坡华人人口（13,749）已超过马来人，跃居多数民族。^{〔3〕}与此同时，檳榔嶼的华人人口也突破了一万人的大关。^{〔4〕}

马来半岛南端的柔佛州（Johore），从19世纪30年代起，马来统治者便锐意发展甘蜜与胡椒种植业，极力欢迎华人移民的到来，因此从新加坡及其他地方来的华人便涌入柔佛。为了吸引华人前来垦植，柔佛统治者便拨出河流交界处的土地，由一个华人领袖来承包发展，是为“港主制度”的起源。港主在其领地内，拥有相当大的自主权。^{〔5〕}到了19世纪70年代，柔佛河两岸已经兴起了29个华人住区。^{〔6〕}人数聚集众多的地方，小店林立，具有了城镇的雏型。

19世纪中叶，马来半岛西岸的吡叻州（Perak），雪兰莪州（Selangor）与森美兰州（Negri Sembilan）发现了锡矿，招引了不少华人移民。这些华人矿工分隶不同的私会党组织——义兴与海山，他们常因矿地开采的权益而火并，使州内秩序大乱，成为英国干预的借口。1874年，英国驻新加坡总督与吡叻苏丹签订了邦咯条约（Treaty of Pangkor），不费一兵一卒，英国就把吡叻置于其卵翼之下。此后雪兰莪、森美兰与彭亨（Pahang，位于半岛东岸）也先后并入英国势力范围。上述四州联合起来，于1894年组成了马来联邦（Federated Malay States）。自英国介入马来联邦属地后，大力发展锡矿业，需要大量劳动力，华人移民蜂拥而至。伴随着矿业的发展，商业、农业、交通运输业等也跟着兴起。一些地理位置优越，华人聚居的

地方，如怡保（Ipoh吡叻属）、吉隆坡（Kuala Lumpur雪兰莪属）与芙蓉（Seremban森美兰属）等城镇，都是由华人胼手胝足、流血流汗开发出来的城市。

到了本世纪初，经过多次试验栽培的结果，证明了马来半岛高温多雨的气候，极适宜橡胶树的种植。适逢那时汽车业蓬勃发展，需要橡胶制造轮胎，世界市场对橡胶需求亟殷，种植橡胶树有巨利可图，于是橡胶树在马来半岛各地（尤其是西岸）广泛地栽植，需要大量的劳力。本世纪的首30年，成为华人移民大规模移植新马的阶段。

一般而言，直至1929年以前，华人移民可自由入境新马。但1930年世界经济不景气笼罩全球，新马经济深受冲击，矿场停顿，工厂倒闭，农业衰退，商业萧条，失业浪潮汹涌。那一年，殖民政府颁布了移民限制法令（Immigration Restriction Ordinance），限制华人成年男性入境，唯妇孺却不受此限。1933年4月1日，政府又颁布了外侨法令（Aliens Ordinance），以便进一步控制移民入境。那几年，移民入境人数每月介于1,000人与2,500人之间，但出境者却超过入境人数。1933年后半期，新马经济逐步复苏，当局稍微放宽入境限额，至1937年初，入境者每月高达6,000人，但此后又逐年减少，直至1941年杪日本南侵为止。^{〔7〕}

就人口结构而言，战前新马的华人多半聚居在马来半岛西岸的城镇。城镇区域，具有经济发展的潜能，足供华人资本家大开拳脚，开拓天地，中下层阶级的成员也有较多经营工商等业与工作的机会。另一方面，由于华人的智力与劳力的贡献，西岸的城镇也愈益繁荣。据1931年的马来亚人口调查，华人在马来半岛各州属市区占全人口的一半以上，其比率如下：檳榔嶼（64%）、马六甲（67.3%）、吡叻（65.6%）、雪兰莪（61.3%）、森美

兰（62.7%）、彭亨（52.2%）与柔佛（56.7%）。至于新加坡的华人更是占绝大多数，占全人口的76.4%。^{〔8〕}

就华人社会人口组成的性质而言，在英属马来亚出生的华人有534,011，占全部华人人口31%，而外地（主要是中国）出生的华人人数却高达1,174,081，占华人人口总额69%。^{〔9〕}尽管每年入境的华人很多，但出境的也不少，人口的流动性是颇大的。因此战前新马华人社会基本上是一个移民社会，具有移民社会的特质。

就华人人口的性别而言，初期男性占了绝大多数，两性不平衡的差距极大。原因是早期华人移民多是成年的单身汉，勇于独闯天下。即使有妻室子女的男性移民，也是把家眷留在故乡，单身匹马远渡重洋，足履斯土。据估计，在19世纪80年代初，男女比例是30：1。但后来因风气变换与英殖民政府的鼓励，女性移民越来越多，到了20世纪首10年末期，男女差距已大约缩减至4：1。自1930年政府实施限制移民法令后，男性移民入境受限，而女性却可自由移殖，人数激增，两性差距渐趋平衡。^{〔10〕}

在日本统治的三年八个月期间（1941年12月至1945年8月），新马笼罩在一片恐怖气氛中，许多青壮年华人被惨杀，南来的移民浪潮当然完全遏止，华人人口的繁衍全然是源于自然出生。

第二次大战后首10年，新马华人人口继续增长。据1947年的人口统计，新马人口总数高达580多万人，其中马来亚联合邦（Federation of Malaya）有490多万人，华人占各种族人口总和的44.7%；新加坡直辖地（Crown Colony of Singapore）有华人73多万，占各种族人口总和的77.6%。^{〔11〕}到了1957年，马来亚联合邦的华人人口高达230余万，占全马各种族总和（620余万）的37%，其中以西岸的吡叻州（539,368）、雪兰莪州（488,634）、檳榔嶼（327,287）、柔佛州（392,425）、森美